



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紀念七·七抗戰五十周年

史料專輯之二

(總第十七輯)

87

yt177/40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七辑

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

史料专辑之二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12月

封面题字：黄稚荃

封面照片：张善子画虎“怒吼吧中国”

（鲁绍先供稿）

主 编：宋海常

责任编辑：赵建强

编辑人员：万金裕 米庆云 姜梦弼

吕振修 陈惠颢

封面设计：李教文

成 都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总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30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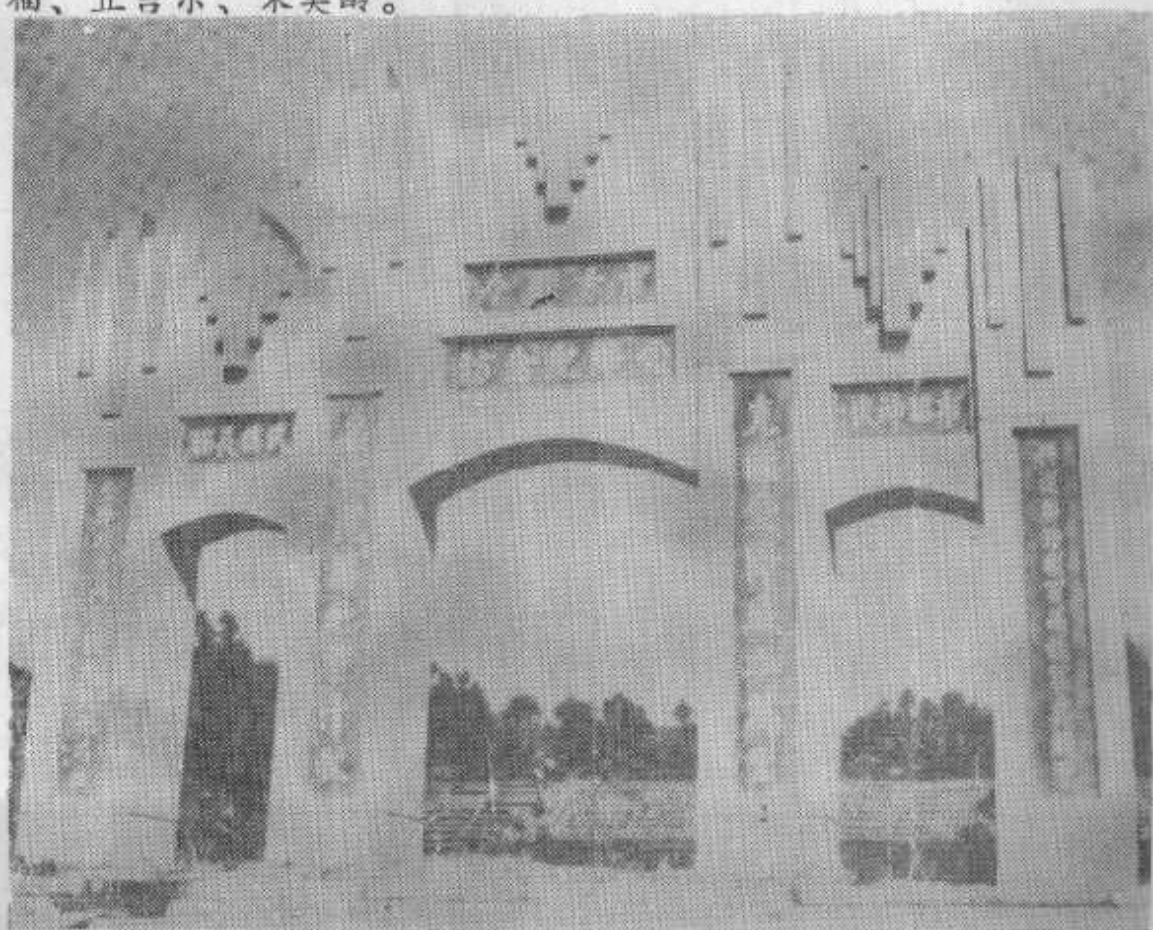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7.5印张 2插页 19万余字

工本费：1.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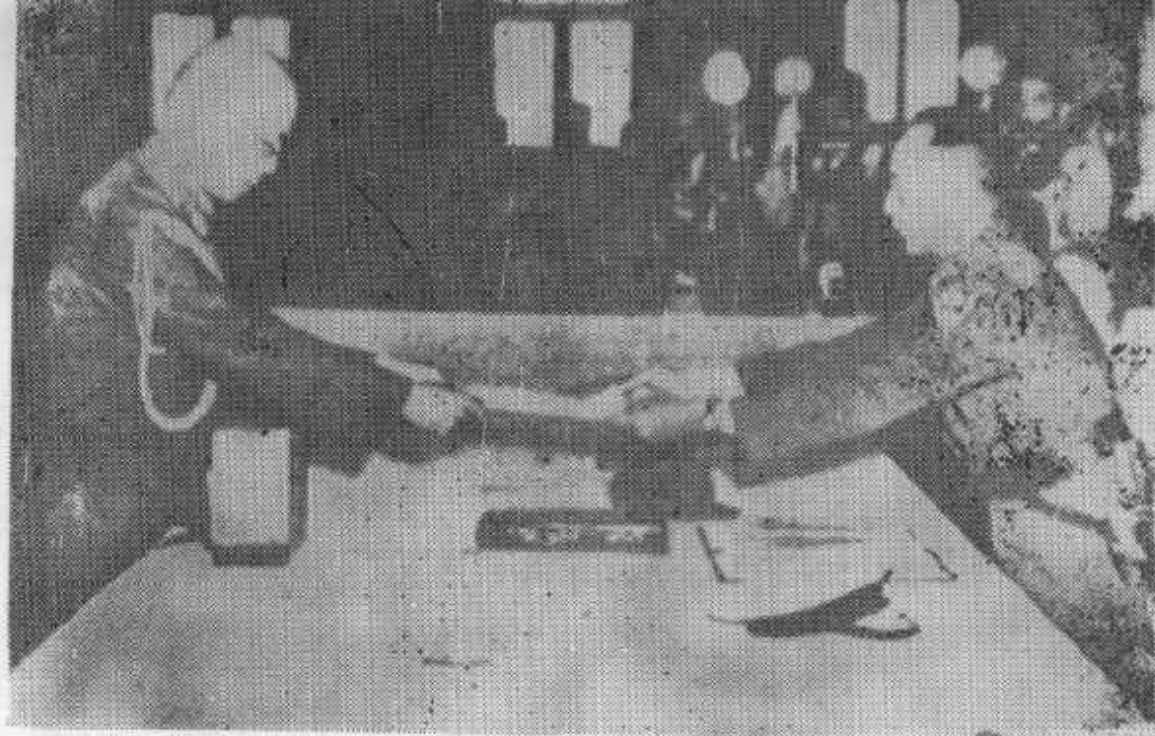


▲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图上自左至右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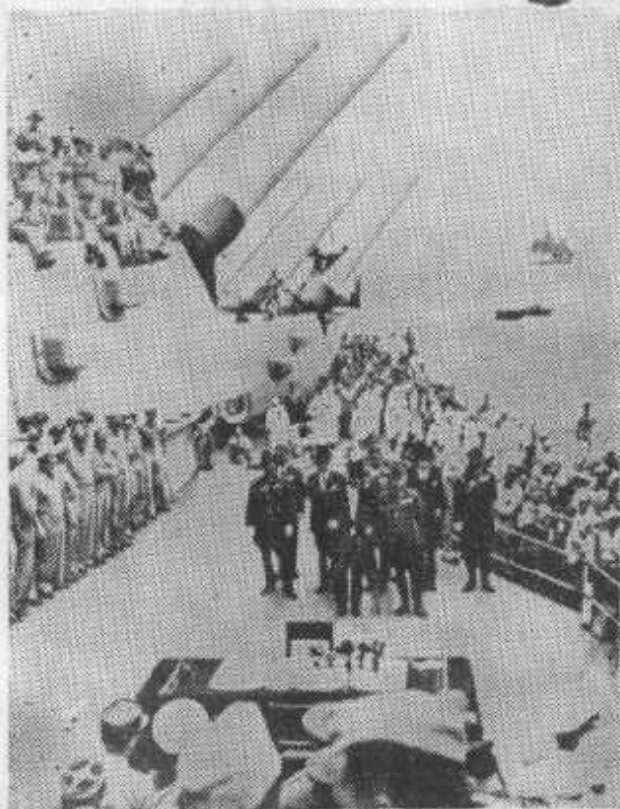


▲我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地之一湖南芷江。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侵华日军总司令
冈村宁次在南京签降后，向我国政府受降代
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盟国在美国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日本
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时的情形。

▼日本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纪念“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史料专辑之二)

目 录

· 侵略者的野心和末日 ·

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宪兵特高组防日反间亲历和见闻

-贾贤瑞 (1)
- 日本投降和中国陆军总部受降内幕.....万金裕 (21)
- 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见闻.....廖季威 (65)

· 浴血抗战忆当年 ·

- 孙元良部血战上海忆实.....万方澄 (86)
- 随军出川抗战的回忆.....骆周能 (96)
- 常德会战亲历记.....邱正民 (104)
- 罗广文部宜昌战役及石牌柳林战斗追忆.....马千毅 (123)
- 转战晋鲁皖鄂忆录.....杨禹文 (132)
- 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日子.....陈嘉善 (139)
- 参与构筑城塞工事及工区运输片断.....任杰夫 (143)

· 抗日将士事略 ·

李家钰将军殉国目击记·····	刘 玺 (140)
常德会战与余程万师长·····	廖季威 万金裕 (148)
阵亡川籍将领雷震·····	龙 腾 (156)
英烈邓从凯血洒长空怨凶顽·····	雷家模 (158)
援助我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事迹拾遗·····	鲁止渊 (161)

· 后方人民的贡献与牺牲 ·

冯玉祥将军在成都的爱民主活动·····	陈孔昭 吴绍伯 (165)
---------------------	-----------------

附录：冯玉祥将军致爱国朋友的第六封信

四川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

·····	阮永熙 潘清雍 岳建功 (194)
大邑征地征工修建桑园机场始末·····	牟国章 樊叔翔 (212)
目击成都遭受敌机最惨重的一次轰炸·····	廖开藩 (220)

· 作者读者与编者 ·

作者和读者来信

勘误校正表

第三辑至十六辑

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宪兵特高 组防日反间亲历和见闻

贾贤瑞

编者按： 本文作者贾贤瑞于1932年至1937年历任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特务警察队驻南京鼓楼区、下关区防日反间两小组少尉、中尉组长，京沪铁路宪兵特高组中尉副组长，1938年至1947年先后被派驻第九战区湘、粤、桂一带和重庆、贵州、武汉、北平等地历任宪兵特高组上尉、少校、中校组长。这篇史料是他回忆撰写的部分 亲历、亲见和亲闻，现经整理发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我曾参与国民党政府宪兵特务机构的防日反间情报工作。由于当时参加此项工作的人，一部份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一部份在解放时起义投诚后。他们交代问题和提供史料，大都是反共罪行方面的材料，而如实提供有关防日反间的史事则不多。所以我虽然也了解得有限，记忆较模糊了，仍尽力根据自己所知，把它切实回忆撰写出来，供人们研究参考，并望知者补正。

一、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猖獗，国民党政府开展防日 反间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东北三省后，为了达到其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在东北三省地区成立了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同时设立了关东军的特务机关总部，以“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为首，开展对我国的情报间谍活动。这个特务机关即在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广泛设

立间谍组织，在日本驻华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商务办事处、新闻社等机关里，以合法外衣大量派遣间谍，并在住华日人中，安插大批间谍。同时，大肆收买华人(包括有地位的军政人员)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通过这些挑拨国共两党关系，挑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以及国民党中央内部各派系的关系，加深中国政局的危机，以利于日本军国主义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妄图实现分裂、瓦解、奴役我中华民族的疯狂野心和罪恶目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间谍不断制造事端，作为借口继续对我国进行军事扩张和动摇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威胁面前，在我爱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向日妥协让步和强烈要求抵御外来侵略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防日反间工作，对付日本的间谍破坏活动。1932年，蒋介石曾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情报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复兴社要员以及宪兵和警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会上讨论和制定了情报组织的改革与加强的方案，具体目的仍不外执行所谓“安内攘外”的基本国策。会议决定扩大和加强宪兵司令部及警察系统的情报组织，除继续加紧搜集国内有关军事、政治情报；搜集工农红军的各种情报，对付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侦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对地方势力进行破坏；对国民党各级党政人员的思想言行进行监视而外，要着重开展外事情报工作，主要对象是监视日本人在华的一切活动，对付日本间谍的破坏阴谋，防止日人再次制造类似导致“九·一八”事变而借口入侵我国的“中村失踪事件”。蒋介石在讲话中特别告诫各情报机关，在共同为国家为民族的目标下，精诚团结，互相协作，努力工作，互相监督，不要闹矛盾，不要互相攻击；并强调要选“忠于党国”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充当情报人员，加以严格的业务培训 and 经常的精神教育，养成“不成功便成仁”的勇士；又强调情报人员肩负着“党国”重大使命，一定要有铁的纪律。这次会议以后，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工作进一步加强，由宪兵司令部主管的防日反间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

二、宪兵司令部设置“特高组”担负防日反间任务

宪兵司令谷正伦，在蒋介石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后，立即采取措施，除大力加强武装宪兵勤务外，并在宪兵司令部下建立了防日反间的外事警察情报组织。谷正伦早年在日本学军事，深知日本宪兵勤务和情报工作有许多可以借鉴之处。于是他组织了一个赴日考察团，去学习日本宪兵那一套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从事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法西斯统治方法，考察团成员都是黄埔军校毕业，深得谷正伦信任的少将级和团职军官，共计10余人，其中有王公遐、韩文焕、丁昌、刘炜、方涤瑕、姚应龙、赵茂高、刘家康、符国秩等。

赴日考察团回国后，首先对《宪兵令》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宪兵令》就是宪兵的职责和如何执行勤务的根本法令。在修改后的《宪兵令》中，特别强调了宪兵在国民党统治中和中国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规定宪兵除主掌军事警察外兼掌普通司法和行政警察，就是说，无论是军队、老百姓和外国人，都在他们职权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在对宪兵的训话中曾说：“整军饬纪，宪兵所司；民众之保，军队之师。党的生存，国家的兴亡，领袖的安危，宪兵都负有重大责任。……”根据宪兵兼管外事警察的职责，宪兵司令部早就有“特务警察队”的设置。赴日考察团回国后，仿效日本宪兵特务组织的“特高课”，又将“特务警察队”改为“特高组”。这个“特高组”受宪兵司令直接指挥，在各级宪兵部队都设有这个组织。每一“特高组”都配有无线电台，用密码传递情报，密码不定期更换。组员不定名额，视任务和需要设置。组员都受过特殊的职能训练，有法西斯式的严酷纪律。在各大中城市分设的“特高组”小组组长与驻地宪兵团长或营长密切配合，监视对象除日本特务、汉奸之外，还包括革命志士、进步人士、大中学校师生以及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人士等。

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防共反共、防日反间的需要，大肆培训宪

兵特务人员。“特高组”领导骨干必须受过中央军校及宪兵学校正规的军事训练，再转入宪兵学校特务训练班接受特务教育。一般组员也必须受过两年宪兵教育，再经宪兵技术军士队训练两年，还要入特务训练班受训毕业，才能为“特高组”正式成员。“特高组”成员除用宪兵司令部名义，公开招考过几次高中毕业生，给予特殊训练外，还有几次专门招收从日本归国的华侨，利用他们娴熟日语的长处，经过专业培训后，作为防日反间的力量。他们大多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人。另外还有一些是“特高组”在其外围组织吸收的人员以及临时雇用收买的人员，这些人不一定都经过专业培训，他们只在一定范围内担任一定的临时任务，不是“特高组”正式成员，更不能充当“特高组”领导骨干。“特高组”成员在参加组织时都必须宣誓：自愿终身忠于领袖，忠于“革命”，严守纪律，如有违背，愿受极刑。这些誓言，还写在特务证件上，以便随时牢记。

“特高组”成员所学的特务课程，十分复杂。我记得有特工概要、谍报须知、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此书是中共叛徒顾颉章所写），切卡工作（切卡即苏共克格勃，由中共叛徒陆梦衣翻译）、外事警察须知、指纹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侦察技术、行动技术、化装术、照相术、无线电收发、密码研究、化学通讯、汽车驾驶、特殊游泳术、日语、捕绳术、警犬训练、看相术、青红帮研究、手枪射击术、摔跤术、科学自卫术、夺枪术、法医学、社会调查学等等。这些课程的教材，多来自日本、苏联、德国、意大利、英国。每个特工人员，也不要求每门课程都精通，但至少具备常识。

“特高组”的任务，从“九·一八”到“八·一三”抗战开始的几年中，主要是防日反共。在抗战开始的两三年内，由于国共合作，反共工作稍有松缓。那时日侨返国，或住在日军占领我国的区域内，防日反间失去对象。“特高组”的目标，遂转到各战区，搜集敌人军事情报及侦破汉奸活动。1940年以后，反共活

动又成为重点。抗战结束以后，则全部力量都投入反共，直到解放。

三、窃摄日方秘密文件，监视日本游动间谍

国民党政府的防日反间斗争开展之初，仅以监视在华日人、侦察其行动为主要任务。后来接受日寇制造“中村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使中国大片河山沦入敌手的沉痛教训，为了防止其再制造同类事件，便对日本在华机关、公私商业场所和住宅，普遍进行严密监视。既注意日人的活动，也着重监视同日人有来往的可疑华人。除派人在固定地方住守外，还设有活动监视人员，如火车、轮船、港口、重要旅馆和娱乐场所，都派有监视和侦察的防日小组。南京的下关火车站，日人来往频繁，特在该站设立武装检查所，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的学生朱炳鑫担任检查员。当朱发现可疑者时，就立即通知宪兵特高组人员，装扮成旅客，加以监视。

一段时间之后，在一次防日工作扩大会议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不少人认为过去防日属于消极性质的，尽管费了很大力气，收获很小，今后要从消极防日，发展为积极反间。此后，防日反间工作便有了新的发展。

反间工作开始，是以南京为中心，逐步发展到上海、北平、武汉，凡是有日本侨民和日本领事馆的地方，都积极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例如：我们在南京的日方公私机关和侨民雇用的华人中，吸收了40余人作为反间组织的利用人员。当时曾通过长时间的调查了解，确认他们具有给我们侦察敌人活动的主客观条件，方才择其可靠者吸收任用。主观条件是他们具有爱国热情、胆大心细，善于应付多变的复杂环境，严守纪律等；客观条件是他们所担任的工作，便于侦察日人活动，收集敌人情报。每吸收一个人，都要做许多思想工作，除晓以国家民族至上的大义外，还必须给以一定的经济报酬。例如在日本使馆任华文秘书的钱念慈，

能忠诚地搜索日寇情报，我们每月最少津贴他 80 元，此外有一些是日方机构里的司机、侍者、通讯员、传达等，我们每月也付给他们 10 元的津贴，逢年过节还送礼物，成绩显著者，给予更多的奖励。

当时在南京的反间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如窃开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密件箱多次，获得大量宝贵的情报，从中掌握了一些大小汉奸的化名。

为了进一步深入获取日方更多更重要的密件，除继续窃开日使馆密件箱，猎取重要文件外，我们还对日人收发的信件，一律加以秘密检查，并注意搜集日本机构、家庭、商行字纸篓里的废纸片，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发现有用的情报。

窃开日使、领馆密件箱之事，进行得非常困难。首先必须准确侦察情况，选择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时间下手。每到周末和假日，家住上海日租界等地的南京日本使馆的主要官员基本上都回家度假或跳舞、打高尔夫球、玩乐去了（苏州日领事馆也如此），把办公室上锁，只留一两个不关重要的日人看守。待至夜深人静，在使、领馆服务的华人都入睡了，我们宪兵特高组的成员便进入使、领馆，在与特高组有联系的华籍职工协助下，从事窃取密件的行动。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万能钥匙，约 100 余把，一一试用，将能打开保险箱的那把钥匙弄上记号。工作结束后，再专配一把更适用的钥匙，以备下次窃用时，无须多花时间。在窃开保险箱时，要带着特制的胶手套，以防留下指纹。对于保险箱中秘密文件存放的位置、秩序，要一一记好，窃取摄影后，仍照原样放好，以免敌人生疑发觉。

在一般情况下，窃取敌保险箱的文件，都是“特高组”派专门技术人员进行的，但也有例外情况。如苏州日本领事馆雇用的华人王孙乾，年轻机智，胆大心细，热爱祖国，他多次为我们的反间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因为他平时十分注意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侦察窃取到日方保险箱的钥匙后，便到镶牙馆找一大块作

牙模型的材料，用来迅速作好该钥匙的模型，照样配制一把适合的钥匙。因此，他一人便能频繁地打开日本领事馆的保险箱，偷窃秘密文件，拿到指定地点拍摄、翻印后归还原处。

从南京日本大使馆的保险箱窃摄文件，我们每次都是从金陵大学的围墙翻入该大使馆，并由在馆内工作的“特高组”成员接应；窃获该大使馆字纸篓里的废纸片，也多由馆内的“特高组”人员捻成纸团，外包硬纸，扔入金大校园，我们的人再拾取。时间久了，有时被学生看见，但他们都投以微笑。

我们窃获日本的秘密文件，多属下述内容：

甲、日本外务省的训令、通报、密令、命令以及对中国外交的指示等；

乙、日本在华间谍机关的专案密件，例如标题为如何“扰乱支那金融”，如何“加强各省与蒋介石的分歧”等；

丙、日本特务机关对搜集我国政治、军事情报的命令。所指情报内容是关于我国陆、海、空军的数量、战斗力、装备、训练情况，国防计划，军队及高级将领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及国民党重要会议内容，派系斗争，各省军阀割据的情况等。还指令日特怎样从事挑拨、离间、破坏、分化等活动；

丁、对于一些特殊事件的电报及特种情报。例如西安事变中，日本使领馆官员对国共两党两军的详细分析以及他们同其国内的往来电报。我们从这些文件中得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份子很希望张、杨将蒋介石杀掉，惹起国共两党大战，使他们坐收渔人之利；

戊、在日领驻地我国发生重大事件的报告。例如我们在湖南长沙水陆洲的日本领事馆获得的密件，是日领向外务省报告湖南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的派系斗争。他们在文电中用甲方代表蒋介石，乙方代表何键派；

己、属于各地日使领馆收买的汉奸名册和支付他们活动费用的化名收据。获得这些材料，供给了我们铲除汉奸的可靠依据。

此外，对于日本派到我国的游动间谍，我们也加以严密监视。例如日本以新闻记者身份派到我国活动的，有《朝日新闻》的特派员和《读卖新闻》的特派员，实际上都是一些无孔不入的间谍。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在我国各种场所横冲直闯，收集大量政治、社会情报，向日本大使馆汇报。为他们开车的老李，是我们吸收的外围分子。随时将他们的活动情况，向我们密报，从而严加监视防范。

日本还有以献艺为名，派到我国进行活动的间谍。例如1934年，日本派来了一个献艺的名叫“万能脚”。他表演用脚写字、画画，很吸引人。他从上海到南京表演后，再由南京乘汽车到杭州转上海。我们对他进行了监视，发现他身上带有微型照像机，这次在江浙一带献艺，实际是来测绘我国京沪杭线地形、山水、桥梁等。

还有不少日本间谍，以旅游观光为名，到我国各地进行活动。经我们检查他们的相机胶卷，常发现其中有我军港、要塞、进出口等照片。我们还在捕获的汉奸口供中得知，他们是在不知姓名的旅游日人的指使下，为日寇干了获取情报的勾当。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当时防日反间工作的十分重要。

四、侦监外交部内的汉奸嫌疑犯

唐××是国民党外交部的次长，为人极端狡猾，处事八面玲珑。他既和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密切往来，也和国民党中央要员的“政学系”、“CC系”、勾勾搭搭，暗送秋波，更明里暗里同日本派来中国的大间谍须磨鬼鬼祟祟地往来。

须磨弥吉郎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阴险毒辣，具有各式鬼蜮伎俩。唐××和他往来甚密，双方进行一些外交事务上的会见乃是正常的，并不致引起人怀疑。但他俩就在这些公开的接触中，进行一些秘密活动。据在日领事馆工作的华人报告，须磨每到外交部会见唐后，往往回馆就拟电报稿，发电报。从我们窃摄他的

报告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唐对须磨泄漏了我国不少重大机密。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老奸巨猾的须磨，以新闻记者的手法提出问题，要求答复，唐无意识地泄露了机密；另一种可能是须磨先谈他要谈的问题，引诱唐谈出须磨不知道的内容；要不然就是唐当了汉奸，有意向敌人提供情报。由于我们的上述怀疑，就开始对唐进行侦监。

但是对身居外交次长的唐××进行侦监，的确是个难题。他具有公开与敌人来往的条件，为人又十分狡猾，反动嗅觉灵敏。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只有在唐的周围布置我们的工作人员，不露痕迹地进行侦察。我们通过很多渠道，费了很大经济力量，吸收了唐周围的通讯员为我们服务，汇报唐的日常活动情况。据通讯员说：“有一次须磨打电话给唐，接电话的人告诉须磨，唐次长因公外出。但须磨仍然乘汽车到外交部找唐，并扬言唐次长和他约好的，叫他等一下。须磨便在会客室坐着等待。当我离开会客室时，须磨便无理地非法地闯进唐的办公室开抽屉，翻文件，还拿了几件文件放在皮包中，于是才说：‘我不等了’，扬长而去。待唐回外交部，我把情况一一向他作了汇报，唐却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言未发。”根据上面的汇报，我们对唐更加怀疑，又进行了长期的侦监，但终因他的官大，没有确实证据，无法处治他，只好以不了了之。

五、郭剑华汉奸案的始末

1934年春，我们设在南京鼓楼区电话局的窃听电话小组，经常发现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人和日本总领事馆秘书柳原敏一通电话。在收听他们的谈话中，听不出为了什么事通电话。久之经分析判断，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暗号。据我们在领事馆雇用的华人小王（反间组外围人员）汇报说：柳原敏一每次通电话后，没有什么动静。但又有一次柳原敏一和那个不知姓名的中国人通电话后，即乘汽车到夫子庙下车，转了一圈子，便乘

原车回领事馆，未接触任何人与任何事物。我们分析，这是用假象来扰乱反间人员视线，使我们放松对他的监视；也有可能他发现我们在紧紧跟踪他，从而放弃了与人接近的打算。俗话说：

“强盗得逞胆越大，天网恢恢受惩罚。”有一次，据电话窃听小组汇报，柳原敏一又和那位不知姓名的中国人通了一次电话，内容与过去差不多。反间人员立刻派了两部汽车等候，增加人员监视柳原敏一是否外出。一小时后，柳原敏一果然乘车出了领事馆，我们的人驱车监视其后，见他的汽车，向下关区方向疾驶。下关区的日侨及日本公私机构甚多，有重要政治、军事、商业作用的大阪码头，有三井、三菱等洋行公司和其他商业机构，还有日人开的须藤医院。柳原敏一在大阪码头下车，进入码头办公的船上，约半小时出来，然后开车到须藤医院，又约半小时，就直回领事馆。我们根据以上情况分析，柳原敏一这次到下关的行动，一定是有目的的。对于这个可疑的案件，我们已经费了10个月的时间，还未侦查出一个眉目，参加这个案件的反间人员十分着急。经过对柳原敏一所到地方作了详细的调查、分析、研究，认为柳原这次先到大阪码头是个假象，目的是逃脱反间人员对他尾随，或者麻痹对他的注意。因为大阪码头当时并无日本商船停靠，也无其他人往来。柳原敏一真正工作的对象，极可能是在须藤医院，那里有许多中国人去看病，华人与日人很容易接近，就给他造就了收买华人及传送情报的有利条件。反间人员遂严密监视一切在这所医院看过病的中国人，对可疑的人逐一侦监。到下午三时许，突然发现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从须藤医院出来，手拿着一瓶药水，东张西望，向进城的方向走去，我们认为在须藤医院看病的多是下关人，此人从城里到此看病，情迹可疑，必须特别侦察和监视，遂派了3个人尾随其后。他走到江南汽车站想乘公共汽车，我们的人同他对话，发现他的表情有异状、有惊慌神色，更加怀疑，于是把他带到附近一家小旅馆，开了两个房间，一间把他关押，一间由我们的人看守，并向上级汇报请示。经反